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社会科学研究文库

江西革命史研究丛书 第二辑

江西苏区若干历史问题研究

罗惠兰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社会科学研究文库

江西苏区若干历史问题研究

罗惠兰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苏区若干历史问题研究 / 罗惠兰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6

(江西革命史研究丛书. 第2辑)

ISBN 978 - 7 - 80199 - 699 - 2

I. 中… II. 罗… III. 江西苏区—研究 IV. K269.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3791 号

江西革命史研究丛书(第二辑)
书 名: 江西苏区若干历史问题研究

作 者: 罗惠兰

责任编辑: 姚建萍 刘荣刚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 本: 130mm × 185mm

字 数: 22 千字

印 张: 7.5

印 数: 1 - 3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199 - 699 - 2

定 价: 2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目 录

第一篇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研究

- 一、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 (2)
- 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是古城会议决定的……………
…………… (7)
- 三、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下山目的探析 …………… (11)

第二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若干问题研究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 (16)
- 二、中国共产党治国安邦的伟大预演 …………… (28)
-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转移 …………… (56)
- 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地位评析 …………… (69)

第三篇 中央苏区肃 AB 团问题研究

- 一、蒋介石建立 AB 团目的的探析…………… (82)
- 二、论 AB 团的覆灭…………… (87)
- 三、南昌“四二”暴动后 AB 团既未恢复也未重建 …… (94)
- 四、肃 AB 团的开始及其恶化 …………… (106)
- 五、历史上关于富田事变的定性及其分歧 …………… (121)
- 六、毛泽东与肃 AB 团 …………… (136)

七、周恩来与肃 AB 团	(143)
八、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前后的肃反	(157)
九、肃 AB 团不是“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	(172)
第四篇 会议述评及考证研究	
一、评“二七”会议的功过是非	(180)
二、再评罗坊会议	(195)
三、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东军内职务原因探析	(202)
四、关于宁都会议几个问题的考证	(207)
五、毛泽东在江西苏区重大活动述评	(213)
六、周恩来对中央苏区的历史贡献	(229)
后 记	(236)

第一篇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研究

这一部分主要论述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地探索中国革命新路的历程,对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进行了分析,对古城会议作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作了肯定,对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下山的缘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山”,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全党最早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最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在古老沉闷的中国大地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大话剧。作为导演这一话剧的毛泽东为什么在革命处于迷惘、危难之际,能果敢、坚定的另辟蹊径,率部踏向“上山”之路?我认为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对农村斗争的深切了解,对农民运动的高度重视,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根基。

对农民,毛泽东是熟悉的,但是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则是从1925年开始的。这年8月,他在家乡帮助组织农会,发展会员,创建韶山支部。1926年1月1日,又发表《中国农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3月,在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翌年初,又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的考察,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这以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农民运动中来,再也没有改变。对农村斗争的深刻了解,对农民运动的高度重视,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根基,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严酷现实,是促成毛泽东“上山”思想形成的催化剂。

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血腥镇压下,中国共产党遭受自成立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巨大挫折,在凶残的敌人欲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人

唯一的选择,只有高举革命的大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否则,坐以待毙,任人宰割。因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无法在城市立足的严酷现实犹如催化剂,加速了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形成,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

中国农民反抗官府揭竿而起,上山安营扎寨的历史借鉴,是促成毛泽东“上山”思想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导因素。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统治专制的国家,历代统治者对农民残酷压榨,迫使农民揭竿而起,奋起反击。为使武装反抗的成果得以巩固,他们往往拉起队伍奔向江河湖海,占领险峻山头,自称为王,与官府抗争。中国社会这一特殊现象不能不对谙熟历史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启迪,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广大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环节,当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处于弱小的时候,何不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何不学学历史上的山大王?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曾说过:“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一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正因如此,在八七会议后,当瞿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做机关工作时,毛泽东坦然相告:我不愿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交绿林朋友。^①无疑,毛泽东从历代农民反抗强暴的斗争中,从绿林好汉上山安营扎寨的历史借鉴中,吸取了“上山”的经验。不过,毛泽东主张的“上山”与历史上的山大王却有本质的区别:一是“上山”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即把革命的武装从城市转移到山区;二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代表人民的利益;三是“上山”不是消极避战,而是逐渐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可见毛泽东“上山”思想,已初露武装割据的萌芽,这对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有着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上山”思想付诸实践的最终成果是引兵井冈,这是他

^① 谭震林等:《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受挫后，几经曲折、不断探索、反复比较才作出的决策。

文家市转兵，为全党率先踏上“上山”之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初期即遭失利。为保存实力，毛泽东当即下令部队停止进攻。9月19日，部队在文家市集中，当晚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上，余洒渡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却主张作战略退却，到湘粤边界一带寻找落脚点，以保存力量，再图发展。在当时，提出这个主张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因为它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原定攻打长沙的战略计划，是要冒“临阵逃脱”罪名风险的。但是毛泽东的主张得到总指挥卢德铭的支持，会议“议决退往湘南”。文家市转兵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战略进攻到战略退却，为毛泽东实施“上山”计划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三湾休整，落脚“井冈”的初步酝酿。

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在此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部队落脚井冈的问题。

当年三湾村党支部书记李立就是为毛泽东送信与袁文才取得联系的当事人。他回忆：“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我们三湾，住在谢生和杂货铺。当时我是三湾村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叫我送到宁冈茅坪袁文才那里去。”袁文才收信后，即“派了军事参谋陈慕平与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一道，跟我们三湾与毛泽东同志接头。他们将宁冈的详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时毛泽东已对井冈山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就作出了上井冈山的决定。”

以士兵代表资格参加三湾前委扩大会的熊寿祺在《回忆井冈山初期的部队生活》一文中也指出：“毛主席在三湾的时候，提出了建立井冈根据地问题，……毛主席指出，部队不能乱跑了，乱跑

肯定要失败。”“毛主席还讲，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几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垮他们。毛主席又讲，我们要和地方武装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把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

可见，毛泽东在三湾提出了落脚井冈山的问题，但未形成决议，“上山”决策的最终确立，是在宁冈古城会议。

古城会议，引兵井冈决策的确立。

1927年10月3日，部队来到宁冈古城，当天在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总结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团结、改造袁王部队的方针，作出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

古城会议之所以能够确立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因为：

第一，险要的地势。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罗霄山脉中段，包括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6个县，高山丘陵占了边界总面积的85%以上，山势既大又险，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峻险的地形地貌，为武装割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罗霄山脉中段各县，距敌人重兵驻守的南昌、长沙、武汉较远，反动军事力量鞭长莫及，加上军阀混战，无暇顾及，而湘赣边陲的地方军阀因内部矛盾重重，“剿匪不力”，更有利于边界革命力量的发展。

第三，较好的党和群众基础。莲花、永新、遂川都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各县还有党的活动分子，宁冈全县还控制在革命势力之中，边界还保存有袁文才、王佐的武装力量。

第四，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边界武装割据提供了物质保障。

罗霄山脉中段极为有利的武装割据条件，促成毛泽东下决心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据熊寿祺回忆：当部队“从三湾开入宁冈，

进驻古城,毛委员宣布,我们今后就在井冈山周围活动,不再去广东找叶挺、贺龙了。……大家感觉有了家似的安定下来了。”曾任师部参谋长的陈树华回忆:“我们在着市住了约三四天,主要是派人分别向井冈山联系,并侦察宁冈的地形,决定今后部队的住处。”毛泽东在听取了侦察人员的汇报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定要上山去,在那里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以便支援周围各地的农民暴动。”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独特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上山”是中国革命遭到极其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斩尽杀绝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中国革命而进行的一次伟大实践。实践的结果,冲破了苏联“城市中心论”的模式,竖起了独立武装斗争的旗帜,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转移,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基础。

在全党,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率先踏上“上山”之路,并能够坚持到最后胜利呢?这是因为:毛泽东一是注重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二是注重实践斗争的锻炼;三是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正因为如此,在秋收起义受挫后,他能及时把“上山”思想付诸实践,成为“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①正如他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的“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这是要在群众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对此,邓小平作了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要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最宝贵的经验。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是古城会议决定的

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心”问题的争论得到基本统一,对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宁冈古城召开前委会议作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这一史实,应不再是有疑义的问题了。然而,1993年第5期《党的文献》上发表的《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古城会议决定的吗?》一文(下称陈文),对此却持否定观点。看后,笔者甚感其中的见解失之偏颇,特谈如下看法:

(一)陈文指出:“原工农革命军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都是古城会议的参加者,他们分别于1927年10月12日和10月19日向湖南省委并中央写了报告,其中均未提到决定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里应该指出三点:第一,余洒度、苏先骏都是贪生怕死,中途开小差,后来堕落为叛徒的人,他们无意建立根据地,自然不会谈到何时何地确定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是不足为奇的;第二,余洒度、苏先骏的报告不仅没谈古城会议的决策,同样也没谈三湾改编。如果以他们的报告提到与否为根据,三湾改编不也要被否定吗?第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罗荣桓、何长工、赖毅等,都不止一次肯定古城会议作出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他们正是贯彻这一决策的亲历者,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倘若用余洒度、苏先骏报告中没有提到古城会议的决策为依据,而去否定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的定论,是不恰当的。

(二)陈文摘引了1927年12月18日毛泽东写给湖南省委组织局的信,信中提议改组前委,“如系行军(即向长沙进)则不称仍用前委(不要变易),惟人员应是……如系驻军则应组湘赣特别委员会以便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以上关于组织各项敬请赐复。”陈文摘引此信是想说明,毛泽东这时还在

向湖南省委请示,是在湘赣边建立根据地,还是向长沙进军。这种分析判断,是不符合毛泽东由来已久的上山思想的。毛泽东于1927年9月14日晚在上坪会议上,已明确决定不能按秋收起义原计划进攻长沙,并以前委书记名义立即通知各团到浏阳文家市集合,9月19日晚又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上否定了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毛泽东不同意进军长沙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不可能在经过三湾改编、古城会议、茅坪安家、游击敌人等一系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活动后,于12月18日还要向湖南省委请示是否向长沙进军的问题。这封信主要是向省委组织部门请示前委组织变更问题,设想了“行军”与“驻军”两种情况,拟不应看做是在请示是否建立根据地,更不宜作为否定古城决策的论据。

(三)陈文认为:“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是湖南省委常委决定,报中央认可的。毛泽东本人又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前委的任务是领导秋收起义,进攻长沙。要改变这一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按组织程序应该经过湖南省委或中央。”按陈文所说“前委的任务是领导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如不经省委或中央的批准,而改变前委的任务,就是违背组织程序的话,那么在上坪会议、文家市前委会议上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和农村进军这一事先并没有经过湖南省委和中央批准,而是毛泽东在当时紧急情况下审时度势作出的英明决策,岂不变成目无组织的行动了?因此,陈文的这种分析也是不妥的。

(四)陈文写道:“袁文才、王佐是宁冈、井冈山一带的‘山大王’,历来对地盘看得很重。这一带虽然有原共产党组织负责人的活动,但毕竟是袁、王说了算的。在袁、王没有参加的古城会议上,能作出在他们的地盘上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决定吗?”众所周知,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的军事会议上,对袁文才、王佐及其所部的情况就有所了解,因此,率部于9月29日到达三湾后立即给袁文才写了信,希望“上山”能得到袁文才的支持和帮助。袁文才也派龙超清、陈慕平、龙国恩3人到三湾见毛泽

东,以探听虚实。结果双方谈得很好。袁文才解除了一些疑虑,然后又派代表送复信到古城,其代表留下参加了古城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不仅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性质、主张和意图,肯定了袁文才进行革命斗争的功绩,赞扬了袁文才的革命精神,还表示愿与袁文才和衷共济。这样以诚相待,使袁文才的代表感到信服。正因为如此,才有10月6日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之举,才能确定在茅坪建立医院和后方留守处,才有了10月7日的“茅坪安家”。这一切都是贯彻古城会议作出的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的实践活动。由此可见,以袁文才没有参加古城会议来否定古城会议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是忽视了说服教育袁文才的历史。

(五)陈文说:古城会议后,工农革命军“全部继续往湘南,不料,在途中遭到遂川县肖家壁反动武装的袭击,……毛泽东和团部及一营一连、特务连冲不过去,被迫撤到井冈山。如果没有肖家壁一击,工农革命军主力显然会往桂东”。这段论述更是不当,史实证明,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沿湘赣边界的游击活动,不论游击到哪里,都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这个革命的“家”,都是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伟大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陈文把“安家”后出击敌人的行动,说成是“继续往湘南”的行动,把红军上井冈山说成是由于“肖家壁一击”,才“被迫撤到井冈山”。按这种观点,如果没有这一击,就没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六)陈文说:“直到5月21日前边界党才接到江西省委批准成立特委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直到这时,上级党组织才明确表示同意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边界党的‘一大’以后,湘赣边界才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全面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阶段。”陈文这一段论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把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组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这两个不同性质不同时间不同要求的问题混为一谈。古城决策,茅坪安家,沿湘赣边界游击,上井冈山与王佐部建立联系,象山庵党员训练班,攻占茶陵、遂川、宁冈等,均属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活动范畴。而在这块

根据地内建立什么名称、什么人负责的党组织,是一个组织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先以武装开辟根据地,后由上级批准建立党组织,是战争年代中合乎规律的行动,怎么能用1928年5月上级批准建立湘赣边特委组织,去否定1927年10月古城会议作出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呢?第二,混淆了是与非的标准。当时的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都存在“左”的思想倾向,对工农革命军放弃攻打长沙,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很不理解,因此,不表态或不批准。但毛泽东从上坪会议后,一直自觉地坚持不打长沙,不攻大城市,到落后山区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到1928年2月就有了初具规模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陈文却把上级批准成立特委作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标准,按此逻辑,那么毛泽东在上级批准前进行的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岂不成了盲动之举吗?如果按陈文所述以上级的指示或“批准”作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标志,那么对边界党的一大后湖南省委那些指示又应如何看待呢?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说道:“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①,结果造成了“八月失败”。如果按陈文的逻辑,以湖南省委的“批准”作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标志的话,这不就是说到了1928年8月仍没有确定在何时何地建立根据地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陈文否定古城决策的“理由”不能成立,古城决策不应否定。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三、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下山目的探析

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出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的决定。这一决定的提出,客观上促使了赣南根据地的建立,因而有不少的党史著作都认定这次会议决定红军下山“是为了开辟新的根据地”。持这一观点的有: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马齐彬等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等等。

实事求是地评价这次会议,我认为以上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柏露会议作出了红四军出发赣南的决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开辟赣南根据地,而是为了在经济上摆脱“万不得已”的困境,在军事上“围魏救赵”,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

第一,井冈山时期,坚持以宁冈为中心的割据区域,反对红四军向赣南出击,是前委的一贯指导思想。

井冈山斗争的岁月,正是全国革命处在低潮时期,无论从客观形势还是从革命的主观力量来看,红四军前委只能将其主要力量放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井冈山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上。红军“只有用全部力量与之争斗,决无退却抛弃。”坚信“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希望是很大的。”^①这一时期,前委对中央及湘、赣两省委要红军离开井冈向赣南或湘南方向发展的指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28年6月30日,在永新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前委作出了红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的决定,并向湖南省委陈述了不向赣南、湘南发展的六条理由:(1)为了“建立宁冈大本营”。(2)湘南敌人的实力雄厚。(3)宁冈“实可以与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作长期斗争”，离开宁冈，可遇“虎落平阳遭犬欺”的危险。（4）“红军在永新、宁冈、安福、莲花一带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有胜利的把握。”（5）到湖南去不能解决经济困难。（6）伤兵多，行动不便。

同时，为了粉碎敌人的“会剿”，保卫井冈山，在军事上、物质上前委也作出了周密的部署：重新修建了五大哨口；储备了较充足的粮食；建立了红军医院；对士兵进行了冬季大整训，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可见，在井冈山时期，坚持立足于建立罗霄山脉政权，反对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湘南出击“为朱毛部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①是毫无疑问的。正如红四军前委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所述：“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意义，政治意义上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十分正确的。”这段话明确表示：红四军若要离开井冈山，一定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不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即不是为了创建和发展新的根据地。

第二，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下山，正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给“我以物质的补充”^②的权宜之计，绝非是为了开辟赣南根据地的长久之策。

井冈山当时的人口不满二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红军主要的经济来源，以前靠打土豪获得，割据一年多，附近各县土豪的财产基本没收，加上敌人的封锁，割据区域与外界几乎隔绝，因而军用物资奇缺，日常生活用品也无法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②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6页。